

阳明学士人社群

历史、思想与实践

◎ 吕妙芬 著

中华学人丛书

非外傳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华学人丛书

阳明学士人社群

历史、思想与实践

◎ 吕妙芬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阳明学士人社群：历史、思想与实践 / 吕妙芬著.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9

(中华学人丛书)

ISBN 978-7-303-22163-9

I. ①阳… II. ①吕… III. ①王守仁(1472—1529)—哲学
学派—研究—中国—明代 IV. ①B248.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39380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5532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与学术著作分社 <http://xueda.bnup.com>

YANGMINGXUE SHIREN SHEQUN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印 刷：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30 mm×980 mm 1/16

印 张：24

字 数：370 千字

版 次：201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68.00 元

策划编辑：谭徐锋

责任编辑：齐琳 林艳辉

美术编辑：王齐云

装帧设计：王齐云

责任校对：陈民

责任印制：马洁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10-58805079

序

本书的完成我要特别感谢许多人，在台大硕士班课程中教导过我的何佑森教授、张亨教授、钱新祖教授、古清美教授，他们是带领我走进这个领域的重要启蒙者。我也要感谢 UCLA 历史研究所扎实而精彩的课程，尤其是 Benjamin A. Elman、Richard von Glahn、Herman Ooms、Carlo Ginzburg 教授的教导和治学风范，更是对我的研究有重大的启发和影响，我亦深觉有幸能在当年客座 UCLA 的沟口雄三教授和夫马进教授的课堂上聆听，接受教诲。如今回想，当时我能吸收学习的其实很有限，许多课堂上的讨论细节也已不复记忆，不过他们深思好学的态度、认真专注的神情，曾经感动我。他们眼神之中流露对学术的热诚偶尔仍会浮现在我脑中，就像普鲁斯特非自主性记忆之完美、鲜活、没有时间限制，我的感动也如此。尽管美好的回忆片段未必反映现实，现实世界也总离不开权力关系的算计与冲撞，但如果我对学术研究尚有些崇高的理想和美好的想法，除了知识内容，我相信这样的感动是一种力量，我也愿意珍藏它。

本书有一部分是改写自我的博士论文，其中有许多地方受益于当年一起修课论学的同学们：祝平一、杨瑞松、廖咸惠、柳丽敏、孟悦、丛小平、王超华、唐泽靖彦、Sam Gilbert, Eugenia Lean, Amy Thomas。他们是我海外学习生涯中重要的精神伙伴，他们的友谊也是我生命中美好的一部分。

这本书大部分的篇章都是在“中央研究院”优良的学术环境中完成的。1995—1996 年我在历史语言所的明清档案室工作，我要感谢我的主管刘铮云教授让我弹性上班，可以更充分利用图书馆；1996—1997 年，“中国文哲研究所”的博士培育计划奖学金让我更有效率地完成博

士论文，也要特别感谢钟彩钧教授仔细阅读我的文稿，提出指正意见。从1998年起，我很幸运可以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内工作，从担任熊秉真教授的博士后研究工作到所内助研究员，我确实在许多的学术演讲和同人的研究讨论中学习、获益，也因为安定而良好的研究环境，让我可以逐步扩展研究的范围。我也要感谢“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对本书关于江右和浙江地区研究的赞助。范毅军教授与“中央研究院”计算中心空间信息技术小组帮忙制作地图，谢庆盈先生在计算机技术上协助，助理黄吏坊、欧姍姍尽心协助研究工作，蔡淑闵、何淑宜和黄绣春细心校对文稿，都在此一并致谢。书稿的部分内容承蒙许多好友阅读指正，我特别感谢祝平一、祝平次、廖肇亨、沈松桥，以及匿名审查人与专刊出版审查委员们所提供的宝贵意见，当然唯有我个人应为内容的错误与疏失负责。

本书大部分的内容都曾经以期刊的方式出版，虽然为配合书的结构，我在内容上略有增删改动。第一章发表在《“清华”学报》(29.2)，第二、第四章发表在《新史学》(9.2、12.1)，第三、第八章发表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集刊》(35、30)，第六、第七章发表在《汉学研究》(15.1、17.1)，第九章发表在《台大文史哲学报》(56)，在此也特别感谢各期刊授予重刊的版权。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父母，他们对我几近完全的信任与爱，让我迂曲漫长的求学生涯不觉得负担，反觉得有意义。陪伴我一路走来，分享和分担我这一路数不清的起伏和忐忑最多的是定维，尽管十几年来我们不断迁移居所，漂泊不定，但定维超乎常人的平稳，始终令我感觉“家”的稳妥与温暖，他的聪明也不时启发我的想法。我们的女儿安芸与本书几乎同时孕育成长，她的存在带给我的绝不止是生命的欢娱，更是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能付出与生命中之不可兼得，我也因而比较明白为何前人对于天堂的描述总是一系列充满矛盾的叙述(种种现实生活中不可能的兼是与兼美)，宣示着谜样的存在情境。无论本书所研究的理学家，或我所信仰的基督教中历代的信徒们，他们当中许多人都相信人生美好的境界总是随时向人敞开着，我尚不知道是否真的只要心中有爱就身处天堂，我更能体会 C. S. Lewis 所说：人躲避天

堂的唯一方式是“卖命工作、不听音乐、不看地也不看天、不爱任何人”。我想若不是我生活中有浓郁的亲情与一个童稚的女儿相随，在研究院日益加增的研究压力下，我几乎陷入地狱般的生活情境。因此，我要把此书献给我挚爱的家人。

吕妙芬

2003年3月 南港

目 录

导 言	1
-----------	---

第一部 学派与讲会的历史

第一章 学派的建构与发展	25
一、阳学兴起的背景：从科举考试谈起	26
二、学派的建构与反对势力	33
三、学术运动：讲会与私学的勃兴	48
四、结语	56
第二章 何谓讲会	58
一、阳明讲会活动	58
二、讲会与书院之修建	77
三、结语	84
第三章 吉安府的讲会活动	87
一、安福与庐陵	89
二、吉水	112
三、永丰	123
四、泰和	136
五、结语	145
第四章 宁国府的讲会活动	148
一、泾县	149
二、宣城	164

三、太平县	175
四、结语	179
第五章 浙中地区的讲会活动	181
一、绍兴府	185
二、金华府	195
三、衢州府	200
四、结语	204
五、三区域的比较	204

第二部 思想与实践

第六章 学派的自我定位	211
一、道统观	211
二、颜子之传	215
三、争取学术、政治的正统地位	224
四、结语	228
第七章 讲学同志的连属	232
一、讲会与交友	233
二、阳明学者的友论	245
三、结语	255
第八章 圣学教化的吊诡	257
一、圣学教化的内容	259
二、工夫论的吊诡	265
三、言说的吊诡	274
四、道德表述的多样性	284
五、结语	290
第九章 晚明江右学者的讲学与地域认同	292
一、晚明江右学者的地域认同	295
二、晚明江右阳明讲学的特殊风格	309

三、结语	327
余 论	329
附录 I：阳明讲会资料	335
附录 II：学者姓名字号生卒年表	342
引用书目	352
一、中日文献	352
二、英文文献	363
索 引	368

导 言

这本书是我从 1993 年开始思索博士论文题目一直延续到现在的学习成果，在这些年里，它从一些模糊的想法和感受，从几个让我觉得有趣的人物和议题开始，逐渐扩展成现在的面貌。尤其这整个研究计划进行的过程，并不是由一个老练的历史学者，以明确的研究方法和视角来操作展开，而是在许多困惑和惊奇的学习经验中摸索着进行。1992 年我才刚转进历史学门接受博士课程的训练，从问题意识、议题兴趣到研究方法都不断徘徊于我过去在中文研究所接受的训练与 UCLA 历史所的训练之间，在既希望仔细研读文本又希望广泛搜集资料，既渴望深入思想家的内心世界又盼望与政治、社会、文化议题有所联系，既欲贴近中国文本与历史风貌又想学西方史学擅长议论的期许下，时常深感挫折。加上所欲处理的阳明学又是从明代典籍到现代学术成果都极丰富的领域，我面临的第一个现实课题是：为什么我值得再写一本关于阳明学的论文？有什么新的事是我可以说的？

今天我自己回顾这段学习历程，看着这本书以这种形式呈现，我确实比较清楚地看出它是如何呼应着美国学界的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逐渐转向社会史取向的思想文化史研究这个浪潮，^① 虽然当

① 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转向其实呼应着整个史学在 20 世纪末的走向，关于传统思想史研究向社会文化史转向，以及思想观念史在语言学转向、后现代各种理论的冲击下所面临的危机与出路等问题，论著很多，可参考 Dominick LaCapra & Steven L. Kaplan eds., *Modern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2; Robert Darnton,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History," in Michael Kammen, *The Past Before Us: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Wri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Ithaca, NY: Cornell, 1980, pp. 327~354; David Harlan,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the Return of Literatur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4 (1989), pp. 581~609 等。下文亦将再做简略讨论，关于美国及日本在中国思想研究领域的转向，可参考 Benjamin A. Elman 的反省，《中国文化史的新方向：一些有待讨论的意见》，见《台湾社会研究季刊》，12 期（1992 年），1~25 页；陈来，《世纪末中国哲学研究的挑战》，见《哲学杂志》，31 期（2000 年），8~22 页。

时我并非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点，甚至可以说在修课过程中，我的老师 Benjamin A. Elman 教授已经相当程度地引导我转向，然而对我而言，这个过程仍充满摸索和疑惑，而选择在明代理学这个领域中耕耘，这种转向更不容易。首先，大部分关于阳明学研究的成果都是以介绍学者个人生平、分析个别学者思想内涵为主，如此大量的研究成果，我真的能完全不顾吗？若要兼论理学思想，我要如何提问？我有能力处理和书写吗？再者，我如何能够找到合适的议题，呈现理学与明代政治、社会、文化的互动面貌？若以社会史的角度入手，理学家个人文集内丰富的资料，我要如何运用？这许许多多的问题，今天我仍然觉得困难，深具挑战性。

在构思与撰写博士论文的阶段，前人探讨过的议题、研究成果仍然以一些迂回而深具启发的方式影响着我的思索，关于此我将于下文略作整理说明。简单而具体地说，我最后选择提问一些我认为尚未被充分阐发的议题，希望能够因着研究视角的不同而在这个以个别思想家及观念史为主导的领域中、在众多已有的研究成果之后，找到一个可以发挥的空间、提出一些新的想法。我第一个关切的问题是：王阳明（1472—1528）个人的思想为什么能够在短暂的时间内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学派，而且快速蔓延、转化？怎样的政治、社会、学术环境提供了这波学术运动以如此的方式开展？新学派的建构又如何冲击着既有的学术和政治版图？这样的问题，势必无法单单以思想内涵来解释，虽然思想内涵也绝非无关紧要。对这些问题的思索，引导我选择分析阳明学派建构与发展的历史来呈现它与明代政治、社会间的互动关系，并发现地方性的讲会活动是阳明学扩展的关键机制，因此论文也以专章来讨论阳明学的讲会特色，希望借此捕捉阳明学术社群在社会中的活动与运作。^①然而我毕竟不能忘情于思想内涵，更不愿意一本以阳明学为主题的论文完全弃思想议题于不顾，因此在几经思量下，我选择讨论阳明学者论朋友之伦以及分析他们如何在道统的框架内为自己学派定位，借此呈现某种属于思想、论述与组织、实践之间的交互关系，也尝试描绘阳明学者在热闹、群性的讲会活动之外，另有属于独

① 关于讲会的成员与形式等问题，本书第二章有专论。

自向内探索静修的一面。

本书在研究的视角与全书架构上仍然延续上述的两个脉络，不过在内容上则增加了五章，不仅所涵盖的时段向下拉长，从原先只处理到16世纪80年代一直延续到明末，研究对象也从原先集中在王阳明与第一代王门弟子扩大到第二代、第三代的弟子群；在地方学术社群方面，本书也比较细致地分章讨论了浙江地区、江西吉安府、南直隶宁国府——阳明学在明代最兴盛的地区——的讲会历史发展；并且增加了二章讨论晚明江右与江左阳明学者在思想内容与文化实践的差异与对话，在这两章中，我也加重了对阳明学思想内涵的讨论。

在进入本书各章主题和论旨的简介之前，我本应该对过去阳明学的研究做一通盘的回顾，然而因为阳明学研究的著作实在太丰富，^①过去也有不少人撰写回顾性的论文，^②在此我不打算用一种巨细靡遗

① 概括而言，目前大部分关于阳明学的研究仍以学者个人生平与思想分析为主，不过晚近出版左东岭的《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则是对阳明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及行为的关系进行研究，试图将阳明学置于当时政治社会脉络中讨论其发生的契机与后续的变化，虽然在内容上与本书并不相同，但在研究取径上有相近之处。而福田殖、中纯夫和陈来对王门讲学活动的注意，也与本书的主题密切相关，福田殖，《罗念庵的“冬游记”について——王门における讲学活动の一場面》，见《阳明学》，6号（1994年），2~27页；中纯夫，《王畿の讲学活动》，见《富山大学人文学部纪要》，26期（1997年），1~81页；陈来，《明嘉靖时期王学知识人的会讲活动》，见《中国学术》（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1~53页。至于阳明学相关学术著作，目前图书馆网络信息方便，我们很轻易可以找到上百种的著作，尚不论其他单篇学术论文，或关涉阳明学议题的晚明文学、教育、文化史学术著作。本书所参考的著作，均列在书后。

② 欧美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阳明学研究回顾，可参见陈荣捷，《欧美之阳明学》，见《王阳明与禅》（台北：学生书局，1984），149~179页；1897—1988年中外有关阳明学研究的论著，见张克伟，《阳明学研究论著目录》，见《书目季刊》，22卷2期（1988年），91~139页；山下龙二对日本学界研究阳明学的综论，可见其《阳明学の终焉》，东京：研文社，1992，第一章《明代思想研究史》，9~94页；阳明学大系编辑部编的《阳明学入门》（东京：明德出版社，1991）中也有许多阳明学研究的介绍，且有朝鲜、日本阳明学的简介。另外，晚近大陆学者的儒学研究成果，可参考郭齐勇，《中国大陆地区近五年来（1993—1997）的儒学研究》，见刘述先主编，《儒家思想在现代东亚——中国大陆与台湾篇》（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2000年），59~122页。

的方式罗列所有的相关著作，而是选择性地就本书在史料运用、问题意识、方法论与写作策略上对过去研究成果之承继与反省之处，提出数点说明。

第一，本书在史料的运用以及部分观点上试图超越黄宗羲（1610—1695）的《明儒学案》长期以来对明代学术史的主导地位。我如此说完全没有贬抑黄宗羲《明儒学案》在学术史上重要成就的意思，其实本书也不是正面与黄宗羲个人见解交锋对话的作品，而是有感于《明儒学案》长期以来成为明代学术史研究的重要凭借，不仅黄宗羲对阳明学派的分类、对学者的评论深深影响着后代的研究，在阳明学者的文集不易得见的年代里，《明儒学案》所节录的文本更是大部分学者赖以研究的重要材料。在这种境况下，稍不深思，很容易让人忘了《明儒学案》本身只是一部 17 世纪黄宗羲对于明代儒学整理研究的著作，其书不仅反映了黄宗羲个人独到的观点与喜好，黄宗羲的许多文字和看法更是“前有所本”，因此《明儒学案》绝不能被当成一部明代儒学史的实录。

当然造成过去学界对《明儒学案》如此强的倚赖，主要还是与清代对明代文献的整理、过滤，以及对明代学术的评断有关。由于学术标准和理想的典范转移，清代学者普遍不能欣赏阳明学者的学术风格，许多阳明学者的文集并不被收录在《四库全书》中，甚至遭到禁毁，即使存留下来的文集也是散落海内各地图书馆，对于阅读和研究造成极大不便。这种现象在近几年有重大的突破，台湾地区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购有日本东洋文库、内阁文库、东京大学文学部所藏明代文集影印本（纸烧本明文集），使得许多过去必须到日本才能看到的善本，能够在台北图书馆中被借阅；而 1995 年以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禁毁书丛刊》等陆续出版，更是在史料上的重大突破。本书的研究和撰写过程中，有幸正逢这一大批明文集的重刊发行，过去费尽力气方能在善本书室中阅读抄录的文字，如今可以被大量地借阅，交相比对，我相信这不仅让许多个人研究者深切感受到研究工作受惠，更是开创明代学

术研究的一个重要契机。在文献材料的取得获得重要突破的今天，我们再谈要超越过去学界过度倚赖《明儒学案》以研究明代学术史的做法，应该不再是一不易落实的高论。

另外，黄宗羲对于学派区分是否恰当的问题，或者《明儒学案》收录的学者以及对学者学术的评断是否公允等问题，学界中也有人质疑和讨论。^① 本书其实没有针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不过从思索议题开始，我便希望能适度地摆脱《明儒学案》对阳明学分类的框架，主要倒不是因为要反驳黄宗羲，而是为要寻找更适合本书议题的看法，或者说是寻找一种更能反映学者们实际交友、互动和对话的分类方式。换言之，以《明儒学案》想要处理有明一代的儒学史的大计划看来，我仍认为黄宗羲以地域和师承对阳明学派所做的分类是相当有根据、有效力的一种方式，只不过这种分类被运用于处理时段较短、欲更仔细探讨阳明学派的建构与发展以及学者的互动时，便显得僵硬而不足。举例而言，地域性的差异在王门内固然存在，但其重要性与时代有关，王阳明生前，门人之间的联系主要以老师为中心，就学派认同而言，第一代门人之间的同门意识明显超越地域因素，但随着时代变迁与学派的发展，在第三代门人身上，我们虽仍能看见学者间跨地域的关联，也仍可察觉某种同门、同志的认同情感，但此时地域性的差异则较早期明显许多。又如出生同一地区的学者之间，不仅他们个人的学术兴趣和师承因缘可能有极大的差异，他们因着仕隐出处所带出的影响力与所影响的地区，也都不是《明儒学案》的分类可以清楚表达的。因此，本书在讨论讲会历史以及江左、江右学术差异时虽然也以地域作区分，但并不是完全跟随黄宗羲的分类，而是从大量的学者文集、个人传记、学者们所生活动力的地方史料着手整理的心得。

^① 例如，《明儒学案》中没有收录李贽，许多人都觉得是出于黄宗羲的偏见，而黄宗羲将深受王畿影响且为浙中学者的周汝登归入泰州学案内，也引人质疑。参见 Jie Zhao, “Reassessing the Place of Chou Ju-teng (1547—1629),” in *Ming Studies* 33 (1994 年), pp. 1~11; 彭国翔,《周海门的学派归属与〈明儒学案〉相关问题之检讨》,见《“清华”学报》,31 卷 3 期(2001 年),339~374 页。

本书对于学者的籍贯和师承固然有所考虑，但学者们独特的思想风格，以及实际的交友互动与学术传承的情形更是考察的焦点。

第二，本书在方法论上刻意不采取传统学术史和观念史的做法，而试着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提问。我自己的硕士论文《胡居仁与陈献章》就是一典型观念史的做法，^①如果我反问自己为什么撰写博士论文时会有如此大的转变？我知道这与我所接受的史学训练以及20世纪下半以来，社会史、文化史研究高涨而思想史相对衰微的现象息息相关，不过即使面对着如此亲身的经历，我也无法清楚理出其中错综复杂的影响因素。我的反省也呼应着许多对史学研究反思的文章都会论及的：研究者所采用的方法与观点本身有其特殊历史性，总是受到其他研究的刺激和影响，而且其间复杂的关系恐怕永远无法被全面、如实地理解与重构。

传统学术思想史以精英学者的作品为研究对象，所欲探讨的主要是学者心灵的意图和思想的内涵。这样的研究取径有其特有的历史性与哲学基础，William Bouwsma 认为西方唯心主义传统中，以人的思维能力（intellect）为人格最高表现，又因为精英占据社会最上层，许多人相信精英的思想是塑造世界进步的重要动力，因此也成为史学研究的焦点。^②不过，自从社会史、文化史在史学界的快速窜起，加上语言学转向、后现代哲学中各种文学批评理论、女性主义、文化理论的提出，不仅整个史学研究与书写面临重新定位与反省的迫切性，学术思想史更是首当其冲。毕竟传统学术思想史以精英文本为主要分析对象，如今从传统研究的对象“文本”到分析的方法都面临颠覆性的挑战，思想史的衰微（或应该说转化）几乎不可避免。

关于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兴起，根据 Lynn Hunt 的观察，主要与马克思主义与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研究有关。20世纪50和60年代的马

① 为1989年台湾大学中文所的硕士论文，修改后的《胡居仁与陈献章》于1996年由台北文津出版社出版，2009年花木兰文化出版社再版。

② William J. Bouwsma,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the 1980s,” in Theodore Rabb & Robert Rotberg eds., *The New History: The 1980s and Beyon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279~291.

克思史学家开启了一波为庶民作史的风气 (history from below), 史学写作的对象不再集中政治领袖和思想精英, 扩及社会各阶层、种族, 以及妇女的日常生活层面。年鉴学派史学的心态史研究或所谓的“总体历史” (total history), 则预设了一个有机整体的社会, 强调以长期、功能性、结构性的研究来掌握社会的整体结构与历史的大趋势。年鉴学派重视总体的方法论本就有欲综合各种学科方法的企图, 学派从创立之初即与社会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等学科有密切的交流。同样于 20 世纪下叶在美国兴起的现代化理论, 也受到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直接影响。这些深切影响着 20 世纪历史解释的不同流派都共同具有对方法论普遍解释效用的信念, 也同样有着将史学向社会科学靠拢的趋向。^①

然而, 无论马克思主义对阶级、下层/上层结构的看法, 或年鉴学派对“社会”有机整体和社会结构三层论的假设, 或社会史研究中对精英/庶民、生产/消费、真实/再现等明确的二分法, 晚近都引发许多质疑与反思。而当一切区分范畴的正当性和有效性受到质疑之后, 过去论述所预设的任何自主性、稳定性亦遭瓦解。^② 过去史学研究及某些学科的分类基本上建立在对文本自主性和稳定性的确信上, 但在这一波解构思潮的冲击下, 文本脱离作者创作意图的制约, 与文化中其他各类文本 (包括文字、象征、图像、仪式、实践等) 交互关联 (intertextuality), 形成一毫无裂隙、不可割裂的网络, 甚至文本在与读者对话的过程中, 不断转化变形。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下, 20 世纪

① Lynn Hunt ed.,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Berkeley &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p. 1~22; 在 *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 一书中, 作者说明 20 世纪历史解释的三大派主要为马克思主义、法国年鉴学派、美国的现代化理论, 三派所承袭的 19 世纪先驱则分别为马克思、涂尔干、韦伯。20 世纪历史解释的三大流派尽管颇有差异, 但其共通之处则为: 对自己理论的普遍性有信心, 因此也把其他地区和其他文化的历史现象同质化地纳入他们认为的一般历史发展模式。参见 Joyce Appleby et al., *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 New York, London: W. W. Norton, 1994, Ch. 2.

② Roger Chartier, “Intellectual History or Sociocultural History? The French Trajectories,” in *Modern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 pp. 13~46.

70—80 年代以来，我们看到的是文化史的盛行，^① 也是传统思想史研究的衰微。毕竟过去思想史研究的范畴边界不再，因为文本不可能独立于其所生产的社会文化脉络，从与其他不同文本之间的交互作用中被切割出来，而文本生产的社会文化脉络也无法被重构，因为所涉及的只是不断彼此指涉的关系。不仅如此，每个文本在其与读者对话的漫长历史中又都带有极复杂、甚至充满矛盾的效应史，任何诠释者在与文本相遇时，尤其是与一种经典性文本相遇时，总是无法逃避文本复杂的效应史；而且，正如人无法逃出历史和语言一样，诠释者本身亦不比文本更具自主性。^②

如果说史学研究是一种与“过去”对话的工作，现在史学家所面对的是一经过重重再现、无法分割、难以确实捕捉的模糊“过去”，且是一随着时间轴与时变迁，并关联于现在之自我的复杂对话过程。从理论上言，通过后现代的洗礼，整全通盘可信赖的方法论已不复可得，现存的只是各种不同方法论与视角制约下，对真实的某种指涉与再现。就史学研究的实际操作而言，面对文本的各类形式与众多数量，加上学科专业的分工与诠释的困难复杂，更让任何“整全”或“比较整全”的企图如同天方夜谭。因此，目前对任何方法论与视角的限制与片面性应该是毋庸置疑的。或许就像我们通过望远镜与显微镜观察自然世界，各有开隐也各有隐蔽，历史研究中微观或宏观、别异或求同等不同视角与探索的兴趣，应该也有类似的各自限制与贡献吧。

后现代理论带给历史学界的危机意识颇深，也引发许多史学家的反思与批判，不过，这样的冲击是否能够彻底改变史学研究重视史料

① 关于文化史在西方史学界兴起的脉络，参考 Joyce Appleby et al. *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 Ch. 6; Victoria E. Bonnell & Lynn Hunt et al., *Beyond the Cultural Turn*,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introduction.”

② David Tracy, *Plurality and Ambiguity: Hermeneutics, Religion, Hope*,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1987, Ch. 1.